

後真相時代的簾幕： 中共對網軍輿論的諧睦與悖反之研析

著者／錢尹鑫 張俊傑

政治作戰學校專 92 年班、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研究所 101 年班、
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 105 年班
現為成功軍艦中校輔導長

備役中校

中共由於政權需求培養「網軍」以為其政策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進行辯護，但是後真相時代的來臨，不斷衝擊既有的認知與價值體系，使得人們不僅不願突破舒適圈，而更沉溺於同溫層現象，後真相時代形構同溫層效應，不但容易形成派系鬥爭與階級對立，且易擴大社會矛盾造成政權動盪。

中共對於網軍之關係並非僅是完全的諧睦關係，雙方亦曾出現衝突與矛盾，雙方關係乃是基於互惠利益的表面善意與威脅衝突的有限敵意，並非出於價值理念的認同，進而產生意外而複雜的政治問題。因此，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與網軍之敵友關係乃是建構在對於經驗事實、理性判斷與形式和諧所產生的對應關係，而非僅是非友即敵的二律背反思維。

中共政權與網軍為輿論效益與利益報酬各取所需，為保持長期獲利，雖有權衡相抗但中共在處理網軍的整體操作上採取友善方程式。然而，基於國家維穩需求，只要網軍衝突到中共的核心利益，必然引起雙方合作與背叛的競合策略。而其訊息傳播的真偽，都可能使政權與網軍捲入鬥爭漩渦，進而產生群眾對於國家政權職能意識的歧見，群眾對威權價值自然產生認同與裂解危機。

壹、前言

隨著傳播資訊的發展，網路媒體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在新資訊傳播結構的變革之中，早已突破以往單一娛樂功能，並朝向多

元應用發展趨勢並具有相對程度的支配力量，而國家機器為政權需要或政策宣導亦需快速便捷的傳播工具，因此各國無論是國內宣傳或涉外行動所需，對於新媒體的重視與操作自然是積極經營，企圖建構網際網路、

大數據、人工智慧與雲端運算的綜合載台，以及成立專業部門或人員來傳達所欲傳播的資訊與形構對己有利的輿論。而中共近年政軍實力快速崛起再加上對外政策的強力經營，對於網路輿論的掌握自是不在話下，此外更培養「網軍」(Cyber Warrior) 以為其政策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進行辯護。然而，後真相(Post-truth) 時代的來臨，不斷衝擊既有的認知與價值體系，也連帶導引民眾思維的轉變，使得人們不僅不願突破舒適圈，而更沉溺於同溫層(Echo Chamber) 現象之中，在主觀意識的選擇下，人們往往只願意接受與自己立場相近的觀點並不斷執著本身持有的立場，對於相反意見越加排斥，進而形成相對程度的群體迷思(Groupthink)。在後真相時代的環境中，中共對於運用網軍從事國家治理與軍隊控制更顯重要與普遍，然而，中共政權與網軍輿論之間的存在關係並非僅單純諧睦或指揮命令關係，其亦敵亦友之雙重性，縱然能夠協助政權維穩，但將也可能帶來威權價值與職能意識的裂解危機。

對中共而言，究竟後真相時代所形成的難題為何？中共操縱網軍輿論的短期獲利

對網軍將產生何種影響？合理行動報酬能否持續？對於中共內部的價值衝擊又將如何？諸多命題殊值研析，而學界對於常用的雙方零和遊戲，慣以博弈理論進行研究，博弈理論乃是基於理性假定，合理評估他方行為並對己方行為作出合理選擇的策略行動，因此「妥協」的機率高於對抗，對於一次性的賽局具有廣泛的解釋力，然而，本文並非僅探討一次性之賽局結果，而是多次動態博弈及其背後隱喻(Metaphor)。回顧分析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Axelrod) 在《合作的演進》(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的理論，有人認為他的研究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參數的敏感假設，透過有限理性互動的進化分析，為促進合作性博弈的條件提供了有價值的總體框架，並進行了重要的方法創新。因此，本文之研究途徑嘗試以阿克塞爾羅德的合作演進理論，並採取文獻分析法，研究後真相時代的現象下，中共與網軍互動模式以及對輿論之存在關聯，並對中共運用網軍輿論導引履行社會公共職能的實惠利益與質變進行探討。¹ 因此，本文之問題意識為探索後真相時代之下中共對網軍之運用關聯，以及中共對網軍輿論敵友關係之質變與價值

¹ Robert Hoffmann, "Twenty Years on: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Revisited," (March 31, 2000), 《Jasss》, <http://jasss.soc.surrey.ac.uk/3/2/forum/1.html> (Accessed 2021/5/21)

裂解危機，並對多次動態博弈結果與友善方程式提出解釋，進而得到若干結論，以為國人參考運用。

貳、後真相時代與新興社群媒體

一、中共政治工作推展的新難題

中共為高度威權政體，在國家治理方面以「政治工作」積極鞏固群眾認同思維與組織群眾集體表徵，並認為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同時也是國家機器履行施政職能與軍隊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根本保證。而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因素莫過於「人」，人心才是主宰任務成敗的主戰場，辯證唯物論者認為存在先於思維，思維為存在而決定，因此，為求政權穩定與軍事任務順遂，以政治工作制度引導教育與實踐是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以往中共傳播工具著重於電視、廣播、報紙等媒體，由於現代化科技進步，中共使用速度更快、來源多樣化、互動性更高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傳播媒介即是新興媒體（以下簡稱新媒體），新媒體使得傳播媒體不再只是單向的傳播平台，而是藉由親自經

營、體驗，產生價值觀並從旁觀者轉為主動的參與者。其中，YouTube、Facebook、Twitter、WeChat 等為大陸人民最常使用的社群媒體，中共藉以宣傳政府施政、發展成效與掩護政策失誤等，皆為政治工作而服務，例如：針對新浪與搜狐等大型服務提供者，都設有專責單位負責監控內容；針對較小型的網站，網路管理者必須親自負責，而地方網路監控機關，通常也會要求他們必須全天候手機待命接聽；多數校園論壇都是由大學的學生事務辦公室、共青團委員會或黨委員會直接督導。²顯然缺乏監督功能與客觀價值，同時亦大幅規範媒體報導自由，難見事實全貌。此外，威權政體在限制媒體自由時，為了正當化其行徑，經常會拿出國家大義作為理由，如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建國大業，³更甚者直接介入教育體系，對政治現象所形成的認知圖像常以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建構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從根本教育著手來達到長期控制之目的。政治社會化是指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學習獲取政治行為定向與行為模式之發展過程；政治文化係指社會

成員對於政治事物的心理取向，其中包括對政治結構、政治程序、政治人物，以及對個人在政治體系中之角色的態度，亦可說是人民賦予政治過程與秩序的一組態度、信仰與感情，同時也包含政治體系的理想與運作規範。⁴因此，中共認為以政治社會化建構政治文化，再以政治文化形構政治社會化，不但是必要手段且須全面與系統地建構意識形態認同體系。

中共以「人民戰爭」起家，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國內政權穩定自然是遠勝於其他領域議題，對當前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而言，新媒體的控制既是為了個人政權延續也是為了長久的國家發展，同時亦須兼顧方能立足不墜。新媒體是既能為善也能為惡的強大工具，中共對於政治工作的推展運用網軍操作群眾認知與行為，以往群眾所接觸的「真相」大部分都在黨政的計畫中發展，在政治文化的曠日持久洗禮下，對於國家發展與施政成效的檢視及思考趨於光譜一端，民眾似乎被後真相時代的簾幕所遮掩，對於極端激進或反動

觀點有關的意識形態群眾意見，只能相對流動在小範圍的區域之內，難以引起內部更大的共鳴與支持。然而，新媒體的發展無遠弗屆，其特徵是拒絕國家主流政治並使用網路媒體傳播有爭議的內容，如此必然會衝擊群眾既有的認知與提出質疑，例如：中共「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作為、反送中事件、港版國安法、蒙獨、疆獨與藏獨等極端主義與分裂主義行動，彰顯出資訊的地下流動與群眾認知軸心的轉變。然而，中共只能更加抓牢訊息流動的出口與限制資訊自由度，造成越來越多的「翻牆」行為，新媒體對於群眾思維的影響與資訊流動的快速化與普及化，導致政治工作面臨嚴重的內外部新型態挑戰，政治工作往往淪為口號與流於形式，很難引起群眾內部共鳴又難以自圓其說，貧富差距過大與貪腐案件層出不窮，更是嚴重打擊社會基層群眾對國家體制的認同，甚至對國家治理與政權穩定造成結構性的障礙，顯然，新媒體的普及化已經成為中共政治工作推展的新難題。

2 韓榮斌 (Rongbin Han) 著，黃文起翻譯，《中共掌控下的網路世界》(Contesting Cyberspace in China: Online Expression an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臺北市：國防部政務辦公室，2021 年 4 月)，頁 59-61。

3 周繼祥，《政治學—21 世紀的觀點》(臺北市：威士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頁 263。

4 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政治文化〉，《國家教育研究院》，檢索日期，2021 年 4 月 21 日，<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7452/>。

5 Richard Kreitner Twitter, "Post-Truth and Its Consequences: What a 25-Year-Old Essay Tells Us About the Current Moment their dreams," NOVEMBER 30, 2016, The Nation,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archive/post-truth-and-its-consequences-what-a-25-year-old-essay-tells-us-about-the-current-moment/> (Accessed 2021/4/22)

6 Oxford Languages, "Word of the Year 2016," 2016, Oxford Languages, <https://languages.oup.com/word-of-the-year/2016/> (Accessed 2021/3/27)

7 時報出版，〈何謂後真相〉，《知識家》，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21 日，<https://www.knowledger.info/2020/03/16/post-truth/>。

二、後真相時代形構同溫層效應

由於全球民粹主義的崛起，對世界各國既有的政治制度引起廣泛的衝擊，個人的單一觀點不斷增加，以及經驗事實與個人觀點之間的界線模糊，新媒體不僅形塑中共政治工作的新難題，同時也逐漸延伸出「同溫層」效應，導致群眾認知轉變促成了後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的出現。「後真相」一詞首次出現在 1992 年 1 月美國劇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發表在《國家雜誌》（The Nation）的文章，特西奇寫道：「我們只會看到政府希望我們看到的東西，而我們認為這沒有錯」。⁸ 牛津辭典公布「後真相」為 2016 年國際詞彙之一，⁹ 並將「後真相」定義為：「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¹⁰ 在新媒體作為新聞來源的興起以及企業對提供的事實越來越不信任的推動下，後真相作為一種新興概念已經找到了其論述的基礎，對於事實真相的理解反而趨向單一極端化，似乎恰如理查・柏頓，

《天道頌》所揭示：

「真相是一面破裂成無數碎片的鏡子，而每個人都以為自己的那一小塊碎片就是全部」。¹¹

後續在西方媒體裡出現了後真相政治這個名詞，所謂後真相，其實是忽視真相、不顧事實的委婉說法，以往人們相信「事實勝於雄辯」；「後真相政治」卻把這條道理反轉，是「雄辯勝於事實」。雄辯滔滔的政客，只要能自圓其說，並且說支持者愛聽的話，便理不直而氣可壯，獲得支持者毫無保留的贊同，不介意他的說話偏離了事實。¹² 後真相政治之所以贏得大量支持者，重點在於群眾對於當前政治現象的不滿、政府機關的不信任，¹³ 以及後真相政治者能提出似是而非的解決方法，而這種「注重感覺、忽略事實」的風行將會加大國家治理的難度，甚至引發國內不同階級的批判聲浪造成社會裂痕，後續有關於國家治理政策的各項議題必然會面臨更大的內部阻力，進而拉大內部階級與派系競合的級距。此外，群眾在獲取訊息的過

程會形成對於真相的「框架效應」¹⁴，而這種效應又會建構群眾對於真相的理解，若透過刻意的認知加工則容易形成極端取向的認知偏見，而群眾往往與觀點立場相近的人常聚在一起形成所謂的「同溫層」，尤其在後真相時代的氛圍之中，利用新媒體引導輿論「帶風向」（Media Framing）¹⁵ 的行舉則是透過這種集體認知偏見，來引導群眾思維並置入特定的意識思想或政治立場，因此，後真相時代形構同溫層效應，不但容易形成派系鬥爭與階級對立，且易擴大社會矛盾造成政權動盪。

參、中共對網軍輿論的短期獲利與質變

一、中共政權與網軍敵友關係之雙重性

國際研究機構針對 25 個國家，2 萬 5 千位網路使用者實施調查，發現 77% 的受訪者曾接觸假新聞，其中 86% 至少上當過一次，而假新聞的主要來源即是新媒體，顯

見其影響範圍之廣。¹⁶ 在討論數位時代的宣傳與資訊戰時，學術界過去比較關注資訊近用（Information Access）或資訊流通（Information Flows）的問題，而今則越來越看重如何在資訊汪洋中讓訊息被閱聽的民眾牢牢記住，並在他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即所謂的「心占率」（Mindshare）。¹⁷ 中共大量運用網軍建構假消息（Fake Information）提高心占率以形塑對己有利輿論，其所運用方式大都為新媒體，新媒體與黨政之間的共生關係，使得網路假消息非但不會消滅，還會因流量膨脹與寬頻速度而加速傳遞。然而，網軍的利弊卻是一體兩面的跟隨著，網軍讓網路世界充斥著釣魚社群、資訊操弄、騷擾並綁架其他網路使用者，使群眾質疑媒體所提供的訊息真實性，並強化對媒體的排斥。¹⁸ 不僅可能迴向反噬治理成果，甚至可能突破領域與階層限制，使得群眾都得識讀（Literacy）各方資訊，耗力費時且對國家社會不具信任關係。

其次，中共網軍所建構的假消息，對於社

8 Hector Macdonald 著，林麗雪，葉織茵譯，《後真相時代：當真相被操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思考？》（TRUTH: How the Many Sides to Every Story Shape Our Reality）（臺灣：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 29 日），頁 35。

9 曾鈺成，〈同營護短〉，《AM730》，2016 年 12 月 16 日，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8 日，<http://archive.am730.com.hk/column-333314>。

10 Daniel W. Drezner, "Why the post-truth political era might be around for a while," June 16, 2016,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steverything/wp/2016/06/16/why-the-post-truth-political-era-might-be-around-for-a-while/> (Accessed 2021/5/22)

11 Hector Macdonald 著，林麗雪，葉織茵譯，《後真相時代：當真相被操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思考？》（TRUTH: How the Many Sides to Every Story Shape Our Reality）（臺灣：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 29 日），頁 95。

12 Joyce Chiou, 〈網軍、資訊戰、帶風向 這些英文怎麼說？〉，《關鍵評論網》，2019 年 9 月 13 日，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4640>。

13 青年日報社論，〈打擊「五毛黨」唯賴民主社群合作〉，《青年日報網》，2020 年 3 月 2 日，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7 日，<https://www.ydn.com.tw/News/374878>。

14 羅世宏，〈面對資訊戰，你不能不知道的網路瀰因〉，《清流雙月刊》，NO. 26，2020 年 3 月，頁 18。

15 Jean-Baptiste Jeang ne Vilmer, Alexandre Escorcica, Marine Guillaume, Janaina Herrera,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 Challenge for Our Democracies (Paris: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and Ministry for the Armed Forces, August 2018), PP. 24-25.

會發展並未產出新的建設性成果，但是會對原有的價值產生懷疑與混淆，有時會催化出行動，易言之，網軍操弄資訊會把被動的觀點或信念轉化成主動的積極行動，其方式類似於激進化的過程，¹⁶ 而此激進化過程將會分化民眾對於國家治理的認同，並引起更大程度的反撲。此外，中共對於網軍之關係並非僅是完全的諧睦關係，這種有限的諧睦關係可以用來說明塑造社會的政策與政權治理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建構關係的理解。非國家主權意識的興起使得國家治理不得不加以考量網軍的支配性力量，而這股力量的激進化結果也會導引民眾意識歧裂，甚至變化出不完全的確定性，脫離原有掌握的軌跡。而在經驗事實上，中共與網軍關係亦出現衝突與矛盾，進而影響政權領導的正當性，產生意外而複雜的政治問題。因此，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與網軍之敵友關係乃是建構在對於經驗事實、理性判斷與形式和諧所產生的對應關係，而非僅是非友即敵的二律背反思維，其所隨附的敵友關係之雙重性則可觀察到新的國家安全威脅來源，可能就是來自於內部治

理與網軍敵友關係的綜合問題，而國家治理多重領域的分界線已趨模糊，治理策略自然也很難進行細微的區隔與分責。

二、合理行動報酬講究實惠

從堡壘內部攻破堡壘，是共產黨的統戰策略，但隨環境的不同，應用的形式也不同。首先，2003 年中共將「三戰」納入《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其中的「輿論戰」參照了美國兩次波灣戰爭期間的輿論操作，目的在瓦解敵方的民心士氣。¹⁷ 其次，從 2019 年 8 月香港「反送中」事件探討網軍輿論操作，推特（Twitter）官方公開表示中共掌握 900 多個推特帳號並大量扭曲報導事實，而這些帳號的 IP 位置大部分皆在中共境內，推特公司第一波封鎖帳號之後，突然又有大量帳號創建，後續再停權超過 20 萬個帳號。¹⁸ 第三，中共國營媒體中新社在 2019 年 8 月 16 日為自家推特帳號招標，用 125 萬人民幣（176,900 美元）要求投標者，幫中新社獲取更多推特粉絲，幾天後發布的另一項政府招標提供 75 萬元人民幣（106,120 美元），以獲得更多的臉書和推特粉絲。¹⁹ 顯見，中

共積極運用網軍建構網路輿論堡壘與政治工作堡壘。

資訊操弄不是新的現象，但最近之所以受到矚目總歸兩項因素：一方面，網際網路和新媒體擁有前所未有的快速傳播的能力，甚至是造成「病毒式」傳播；另一方面，我們的民主政體正經歷著信心危機，導致公眾輿論貶值，甚至連真相也變成相對的概念，²⁰ 現代化社會難以阻止網絡攻擊，甚至更難以反擊，²¹ 而評估對基礎設施造成的損害相對容易，但評估這種攻擊的意圖則相對困難。資訊操弄是中共慣用的言論箝制手法，其政權與民意的矛盾關係反應了，其運用網軍建構輿論引導民眾認知過程缺乏真正的善良治理（Good Governance），所以其治理過程常會出現抽象又主觀存在的政治利益模式，這種模式會讓群眾成為權力鬥爭下的犧牲者，不斷生活在計劃資訊的壟罩之中。最後，中共政權維穩與正面輿論需求亦彰顯與網軍合作之必然性，而網軍亦能從中獲取更高的

職務階級或金錢利益，因此，兩方交往現況所蘊含的社會價值與實質意義在於合理行動報酬講究實惠，雙方藉此建構出有連結意義的行動意涵與可操作的政策輸出，其所犧牲的代價便是網域空間訊息流動的真實性，以及破壞網路秩序規則的集體共識，而雙方之短期獲利復因背叛與合作的雙重性，陷入跌宕起伏的螺旋博弈困局。

三、利益衝突產生的質變

中共對於網軍的運用可以追溯至「五毛黨」²²，哈佛大學政府系加里・金（Gary King）教授帶領的團隊研究發現：首先，五毛黨可能是主要由各機關公務員來兼任的，因為中共政府已經雇用了一大批公務員，那麼要求各機關公務員都多花點時間貼文，這顯然比額外聘一群專門貼文的人來說更省事；其次，這些受政府聘的五毛黨，貼文內容大概有 60% 都是讚美中共、讚美黨，而跟其它網友爭吵、筆戰、護航的比例遠低於 20%；第三，五毛黨貼文並非隨機，而是只

16 Jean-Baptiste Jeang ne Vilmer, Alexandre Escorcica, Marine Guillaume, Janaina Herrera,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 Challenge for Our Democracies (Paris: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and Ministry for the Armed Forces, August 2018), P. 25.

17 閻亢宗，〈中共對臺輿論戰與我對應策略〉，《康大學報》，第 7 期，106 年 6 月，頁 10-12。

18 自由時報，〈中國散布假新聞抹黑反送中！推特、臉書停權 20 萬帳號〉，《自由時報網》，2019 年 8 月 20 日，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21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889665>。

19 張婷，〈內幕：中共如何獲取推特帳號 進行虛假宣傳〉，《大紀元網》，2019 年 9 月 20 日，檢索日期：2021 年 4 月 28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9/9/20/n11535181.htm>。

20 法國外交部「分析、預測與戰略中心」及法國「軍事學校戰略研究所」，林依瑩譯，〈資訊操弄：對民主的挑戰〉，《新世代安全論壇》，2018 年 9 月 4 日，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2 日，<https://www.diplomatie.gouv.fr/en/french-foreign-policy/manipulation-of-information/article/joint-report-by-the-caps-irsem-information-manipulation-a-challenge-for-our>。

21 Christopher S. Chivvis and Cynthia Dion-Schwarz, "Why It's So Hard to Stop a Cyberattack — and Even Harder to Fight Back," March 30, 2017, The RAND Corporation, <https://www.rand.org/blog/2017/03/why-its-so-hard-to-stop-a-cyberattack-and-even-harder.html> (Accessed 2021/3/12)

22 「五毛黨」最早係指受中共官方雇用，專門發表擁護共黨執政言論，營造有利輿論的大陸網路評論工作者。他們通常以一般網民身分，在各大論壇網站「發帖」，支持中共政策，或攻擊批評共黨施政的其他網路言論；他們也可能同時具有網路監控人員身分，所採取的網路傳播策略，以及試圖影響、製造網路輿論的目的，都與中共宣傳機構有關。青年日報社論，〈打擊「五毛黨」唯賴民主社群合作〉，《青年日報網》，2020 年 3 月 2 日，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7 日，<https://www.ydn.com.tw/News/374878>。

要有重大爭議事件或時間點，各機關間似乎就會協調好一起跑出來密集貼文。²³ 另外研究發現，像中共這樣的專制政權，擁有強大的國際影響力和軍事力量，對其統治的威脅來源通常集中於自己的人民。²⁴ 因此，五毛黨顯然是中共在網域空間所培養的政治宣傳員與網路打手，以達控制輿論及導引群眾意識之功效。

然而，中共與五毛黨之間並非僅是單純諧睦或指揮命令關係，以「染香救夫」事件為例，原自稱五毛黨黨主席的微博網路紅人「染香」（本名：袁瑞娟），他此前常發表維護中央獨裁專制政權、批評西方民主自由等言論，在中共官方主辦的 2012 年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共同會議上接受黨媒環球時報編委邀請發言時，稱自己是五毛黨而感到驕傲。²⁵ 其丈夫是中共前外交官楊恆鈞，2019 年 1 月 19 日楊恆鈞與袁瑞娟自紐約飛抵廣州時，楊恆鈞直接在廣州機場被中共當局帶走調查，袁員行動自由也遭受到限制。楊恆鈞發表支持民運、同情民運，被認為是遭逮捕的主要原因，而楊員真實身分一直受到外

界揣測，有說法是楊員為中共前主席江澤民海外特工，也有說法是澳洲安全情報局的雙面間諜。然而，無論其真實身分為何，染香救夫事件突顯出中共時下黨國整肅異己與防範染「顏色革命」的政治需求，更甚者 2018 年 12 月加拿大警方應美國要求引渡華為（Huawei）副總裁暨財務長孟晚舟，而楊員則成中共要脅美國與澳洲之籌碼。²⁶

因此，國家政權穩定涉及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等諸多領域，而網軍輿論僅屬政治利益之一部而非全部，政權與網軍雖有利益交集，但並不意味著利益的完全疊合，在雙方非交集區自然有異於彼此的相對自主需求，從而產生抗拮與衝突。而這些潛在的變數將會加大雙方利益的衝突，進而導致相處關係的質變，質量法則是共產主義的主要革命理論，量的漸變轉換成質的突變，再者依照中共以往的經驗律則觀之，適度汰除影響力過大或反其道而行的網軍，再重新培育新的網軍人員乃是否定論的具體實踐，亦彰顯否定之否定的唯物辯證公式即為質量法則與矛盾法則的綜合運用。

肆、社會權威價值與職能意識的裂解

一、國家治理條件與社會脆弱性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探索塑造社交媒體格局的模式和趨勢，在 2005 年開始追蹤社交媒體的採用時，只有 5% 的美國成年人至少使用了其中一種新媒體平台，到 2011 年使用社交媒體比例已上升到所有美國人的一半，2019 年已有 72% 的群眾至少使用某種類型的新媒體。²⁷ 美國聯邦機構的一位科學家寫道，我們正處於一個孤立主義、本位主義與強烈反對的發展時期，它將削弱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到 2030 年可能達到頂峰。阿拉伯之春運動更是早在 2010 年底爆發，透過網路社群媒體，群眾展現集體智慧提升示威抗議的活動力，並擴大一般民眾的參與度，尤其證明了網路新媒體具有支持廣大群眾運動與推動政治轉變的無限潛力。²⁸ 顯見，無論是何政體都正在面對新媒體所帶來的新挑戰，並採取相應措施。然而，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在於，新媒體不

常見的新聞來源造成安全漏洞，資訊的質量和可靠性也可能會下降，而且對於轉引用的二級資訊發布者缺乏問責制，媒體會導致誤導性資訊的傳播以及個人觀點和現實界限的模糊，最終將失去對資訊源的控制權。²⁹

對中共而言，當前由於美中貿易戰、經濟下滑、中印邊界衝突與新冠肺炎疫情等，不斷衝擊治理績效與涉外行動，維穩國家政權自然是最重要的事。在馬克斯主義的共產主義論中，對抗外部國家威脅與建構內部良好的政績被認為是國家治理的公共職能，亦是中共履行黨政軍領導與權力分配的統治基礎，黨政一體化的治理體制因履行社會公共職能而得以延續，特別是在中共當前對外發展與反腐倡廉的權力鬥爭環境下，以黨的優質領導與作風優良的軍隊作為號召，其媒體報導政策執行大多趨向為國土安全導向與滿足民族主義為主。國土安全政策議題可以做為善良治理的重要環節，主要是因為它不僅意謂著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也是對國家治理缺口與市場機制的有效補充，³⁰ 而社會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也是國家對於當前社會問題的觀察標的與擬

23 王宏恩，〈哈佛大學怎麼研究中國五毛黨？又有什麼發現？〉，《菜市場政治學》，2017 年 3 月 11 日，檢索日期：2021 年 3 月 28 日，<https://whogovernstw.org/2017/03/11/austinwang22/>

24 GARY KING,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 2017, pp. 484-501.

25 劉瑩，〈大五毛染香的丈夫楊恆鈞遭中共秘密起訴〉，《中國禁聞網》，2019 年 7 月 21 日，檢索日期：2021 年 3 月 27 日，<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nnews/20190721/1161696.html>。

26 中國禁聞網，〈楊恆均中國失聯：中國為孟晚舟案在向澳洲政府施壓〉，《中國禁聞網》，2019 年 1 月 23 日，檢索日期：2021 年 4 月 27 日，<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baitai/20190123/1068846.html>。

27 Pew Research Center, "Social Media Fact Sheet," June 12, 2019,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fact-sheet/social-media/> (Accessed 2021/5/21)

28 林維國，《新媒體與民意：理論與實證》，（台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9 月 5 日），頁 68。

29 Michael D. Rich and Jennifer Kavanagh, Truth Decay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8), pp. 115-116.

30 黃秋龍，《非傳統安全論與政策應用》（台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 年），頁 240。

定政策的重要依據，它牽涉到的是國家治理機能疲弱與脆弱性的深層問題，社會既是承載權力的平台亦是國家治理的關鍵變數。因此，從網軍操作社會輿論與突顯國土安全政策績效來看，亦不難觀察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控制力的相對弱化，以及在新媒體形態下，國家治理條件不佳導致社會脆弱性擴大化，引發其潛藏已久的社會問題再加上治理機能疲弱，無法採取有效的緊急應對政策從而平息民怨，自然演變成政權危機。

二、多次動態博弈與友善方程式

後真相時代下的客觀真理似乎比個人認知的單一觀點還要微不足道，事實上客觀政策的研究在於瞭解真相與在不同政策環境中的涵義，並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客觀和獨立的分析成果。³¹ 在學界博弈理論對於一次性的賽局具有廣泛的解釋力，博弈理論認為理性的利己主義者會合理評估對方行為而後對己方行為作出合理選擇，在囚徒困境的模式下，每一參與者皆有賽局優勢—背叛（Defection），但背叛並非是雙方或個人的最大利益，因為背叛抉擇之利益小於合作選項，雙方之所以採取背叛，其考量並非利

益極大化而是風險較小化，若以完善的訊息機制或和諧友善的常態環境，則合作選項較有達成的可能性。然而，在重複博弈的多層賽局之中，建立於互惠（Reciprocity）和諧基礎的策略抉擇，卻可以使博弈雙方發展穩定的合作關係，其中意涵：永遠不背叛別人。阿克塞爾羅德透過有限理性互動的進化分析，為促進合作性博弈的條件提供了有價值的總體框架，他認為基於互惠立場，背叛並非利己的必要條件，互惠選項的抉擇在於雙方的互惠條件，而條件會限制成果，客觀的互惠條件建構於主觀的認知與意圖，資訊不透明或資訊落差容易造成博弈者，對於他方的敵意與善意在認知與需求上的差異，因此，雙方合作之契機應是來自於對於利益獲得的主觀感受，以及面對威脅之處理意願與相應能力，主觀的認知是具有可操作性的，端視主事者客觀評估內外威脅條件而定。

以「合作的演進」觀之，若對手前局選擇合作，己方也較易選擇合作；若對手前局背叛，己方則容易選擇背叛，長期的合作選項能夠從最初的利己狀態，演變為相互之間的利他主義與行為並持恆維繫。³² 因此中共

與網軍的交往方程式應為：合作帶來合作；背叛換取背叛。中共政權與網軍的交往關係建構在主觀認知的合作基礎，為輿論效益與利益報酬各取所需，因此為保持長期獲利，雖有權衡相抗但中共在處理網軍的整體操作上，相抗將帶來不利的結果，所以必然採取「合作帶來合作」的友善方程式。同時，對網軍而言，其與中共政權之互動並非一次性的零和賽局，不直接對抗政權反而會使自身更加穩定，將更有利於網軍政治槓桿的操作，且足以用來應付中共的潛在壓力，而當網軍所面臨的威脅大於安全需求時，經常會採取降低可能威脅與維繫利益的行動選項。因此，中共與網軍之諧睦乃是基於互惠利益的表面善意與威脅衝突的有限敵意，並非出於價值理念的認同，雙方互動乃是基於多次動態博弈之考量，為利所趨。然而，只要網軍觸碰到中共的核心利益或維穩需求，必然引起雙方合作與背叛的競合對抗，中共一旦處理網軍的背叛行動將會引起其他網軍的高度戒備，更甚者，詳知細節的網軍為己預留後路或設法脫離當前職務，成為中共政治的潛在危機。

三、威權價值與職能意識的裂解危機

2016 年 Facebook 的假新聞每個月約有 2 億則，Twitter 每個月的假新聞也有 2000 萬則。雖然在各方重視後，網路平台採取行動減少假新聞，但 2018 年 Facebook 的假新聞每個月仍有 7000 萬則，Twitter 每個月的假新聞也有 600 萬則，由此可見社群媒體假新聞的氾濫。³³ 假新聞不僅容易轉易他人信念，更可能轉化為實際行動，一位資深的保守黨議員莎拉・沃拉斯頓（Sarah Wollaston）因對後真相政治的抨擊，從英國脫歐戰役中由支持脫歐轉而支持親歐盟，而其他議員也有異音，³⁴ 因此，其中涉及的是信念與價值觀念的遞轉，顯見，新媒體假新聞氾濫之影響已深達行動之轉變。此外，中共對於新媒體控制相較民主國家更加細微，政治菁英刻意操作新媒體對國內外進行政治文化掌控與宣傳已是常態。澳洲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針對中共科技公司在全球擴張情形，2019 年 4 月所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共的資訊科技、電信公司與共產黨之間的密切關係，引發全世界強烈疑慮，其

31 Molly Morgan Jones, "In a 'Post-Truth' World, Evidence and Experts Matter More Than Ever," December 16, 2016, The RAND Corporation, <https://www.rand.org/blog/2016/12/in-a-post-truth-world-evidence-and-experts-matter-more.html> (Accessed 2021/4/11)

32 Timothy Killingback and Michael Doebele, "The Continuous Prisoner's Dilemma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through Reciprocal Altruism with Variable Investment,"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Vol 160, No. 4 (October, 2002), pp. 421-436.

33 楊惟任，「假新聞的危害與因應」，《展望與探索》，第 17 卷第 12 期，2019 年 12 月，頁 100。

34 Ned Simons, "Tory MP Sarah Wollaston Switches Sides In EU Referendum Campaign," June 8, 2016, HUFFPOST,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uk/entry/tory-mp-sarah-wollaston-switches-sides-in-eu-referendum-campaign_uk_57587e00e4b0415143693876?guce_referrer=aHR0cHM6Ly96aC53aWtpcGVkaWEub3JnLw&guce_referrer_sig=AQAAANbvgePeQzZxZ1xcuxgUaT4ZQcQOwxrUR_LpISz8qoEmY8z8MpmZlpfArIzVg-NtiGN5d5W5xJs6R486WsQxOwoySC-P2Vb5BQc-vtz-Zmdz4ejtIVISjdvK01IGaxg50AUv59SiLvS8DFIErsIMlgh3X-5Xtx--CAZfAxIVkogq&guccounter=2 (Accessed 2021/4/24)

所輸出的監控科技是否被共產黨用來作為推進戰略目的，與地緣政治利益的工具。³⁵此番報告引起印太周邊國家對於中共威權體制的高度警戒，經過各國新媒體的放大與深化效用，更是斲傷中共印太戰略佈局的正當性以及降低周邊鄰國信任的關鍵。

對中共而言，辯證的否定是在事物內在矛盾下，而進行的一種自我否定，是事物的自我運動、發展的辯證過程，是事物辯證否定的結果，只有通過事物的辯證否定，才能實現舊事物向新事物的轉變，實現事物由舊的性質樣態上升到新的性質樣態。³⁶中共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早已突破單純以武裝力量與政治壓迫作為威脅群眾的手段，藉由辯證否定逐漸突顯以具體執政成效做為其政權正當性之依據，但威權價值仍凌駕於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之上。在對國內部份，雖然經濟基礎的底層建築會影響上層結構的唯物辯證發展規律，然而，各項經濟基礎建築，實際上仍是框架在更高頂層設計的政治戰略之下，共產主義國家政治戰略之下的政治溝通主要有兩個面向：一個是政治宣傳（Propaganda），另一個是激進言論

（Agitation），政治宣傳主要是透過媒體操作，而學習運動主要是在地方進行，政治宣傳與學習運動結合起來控制資訊流動，可能也有助於維持其黨員的政治信仰。³⁷而政治宣傳常用的新媒體所帶來的矛盾真相（Competing Truths）會讓黨員與群眾對於當前中共執政的威權價值產生質疑，而任何質疑都將遭受嚴密監控與封鎖，其對象涉及範圍甚廣，訊息來源多樣性，因此，無論訊息傳播真偽都有可能捲入政權與網軍的矛盾鬥爭漩渦，進而產生群眾對於國家政權職能意識的歧見，再加上國家治理機能疲弱、社會脆弱性與網軍的矛盾悖反等諸多因素，群眾自然產生威權價值認同與裂解危機。

伍、結語

後真相時代的來臨不斷衝擊既有的認知與價值體系，也連帶導引民眾思維的轉變，在主觀意識的選擇下，人們往往只願意接受與自己立場相近的觀點，對於相反意見越加排斥，形構成爲同溫層效應不但容易形成派系鬥爭與階級對立，且易擴大社會矛盾造成政權動盪。當前中共以政治社會化建構政治

文化，再以政治文化形構政治社會化，積極運用網軍操作群眾認知，對政治現象所形成的認知圖像受到計畫性的教育與制約。然而，新媒體對於群眾思維的影響與資訊流動的快速化與普及化，導致政治工作面臨嚴重的內外部新型態挑戰，政治工作往往淪為口號與流於形式，很難引起群眾內部共鳴又難以自圓其說，貧富差距過大與貪腐案件層出不窮，更是嚴重打擊社會基層群眾對國家體制的認同，甚至對國家治理與政權穩定造成結構性的障礙，變化出不完全的確定性，脫離原有掌握的軌跡。在馬克斯主義的共產主義論中，對抗外部國家威脅與建構內部良好的政績被認為是國家治理的公共職能，亦是中共履行黨政軍領導與權力分配的統治基礎，黨政一體化的治理體制因履行社會公共職能而得以延續。在新型態的傳播模式下，中共不斷以網軍輿論堆掩政策誤失與描摹美好社會，然而，經濟結構的基層條件與效應會決定高階政治的基本內容，以及量變而導致質變的唯物辯證發展規律，易言之，太多經濟結構不佳的量變將會成為政治動盪的質變。國家治理條件不佳導致社會脆弱性擴大化，引發其潛藏已久的社會問題再加上治理機能疲弱，自然演變成政權危機。

此外，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與網軍之敵友關係乃是建構在對於經驗事實、理性判斷與形

式和諧所產生的對應關係，而非僅是非友即敵的二律背反思維，兩方交往現況所蘊含的社會價值與實質意義在於合理行動報酬講究實惠，雙方藉此建構出有連結意義的行動意涵與可操作的政策輸出，而雙方復因背叛與合作的雙重性，陷入跌宕起伏的螺旋博弈困局。顯見，中共與網軍之諧睦乃是基於互惠利益的表面善意與威脅衝突的有限敵意，並非出於價值理念的認同，雙方互動乃是基於利益的多次動態博弈之考量。最後，群眾對於國家政權職能意識的歧見，再加上國家治理機能疲弱、社會脆弱性與網軍的矛盾悖反等諸多因素，群眾對於威權價值自然產生質疑與批判。因此，在後真相時代，中共對於網軍的運用除了彰顯意識形態控制力的相對弱化之外，更可觀察到中共犧牲網域空間訊息流動的真實性，以及破壞網路秩序規則的集體共識，不但容易擴大社會矛盾與政權動盪，更可能造成國家職能意識的裂解危機。

35 自由時報，〈中國輸出數位威權主義 澳洲智庫報告中譯版上線〉，《自由時報網》，2019年8月14日，檢索日期：2021年5月3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883452>。

36 邱延正，「從辯證法邏輯看中共領導人更替之指導思想—否定觀之揚棄定律」，《展望與探索》，第18卷第2期，2020年2月，頁42。

37 周繼祥，《政治學—21世紀的觀點》（臺北市：威士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頁263-264。